

中国战场是二战的东方主战场

□ 左凤荣

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

第二次世界大战主要是在欧洲、亚洲和北非战场进行的，中国战场是亚洲的主战场，相对于西面的欧洲战场也可以说是东方的主战场。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空前的大危机，在克服这场大危机中，反动的法西斯政权在德国、日本和意大利这3个封建传统比较深厚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了胜利，这些国家走上了侵略扩张的道路。中国是受法西斯之害最早和最大的国家，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中国率先开始了反法西斯战争。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了全面抗战阶段。

中国进行的抗日战争是很艰苦的。从国际上来看，当时的大国领袖们缺少战略眼光，没有认识到法西斯是国际公害，1936年德日意签署《反共产国际协定》，以反共为名联合起来，而受到其威胁的国家仍然矛盾重重，都在谋求自保。欧洲弥漫的是绥靖主义气氛，美国则沉浸在孤立主义和平主义之中，它们还没有完全从大危机中走出来，国际社会对中国制止侵略的呼吁置若罔闻。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旨在维护和平的国际联盟并没有发挥制止日本侵略或制裁侵略者的作用。日本侵华，在大国中英国的利益受损最大，但英国也力避与日本发生冲突，处处妥协退让。从中国国内看，当时中国并没有完成工业近代化的任务，仍是一个农业国，中国与工业强国作战，困难可想而知，甚至医用纱布还得用日本生产的。1939年9月欧战爆发，英美奉行先欧后亚的战略，中国只能“苦撑待变”。这一时期中国独自抗击日本的疯狂侵略，中国战场当然是东方的主战场。

在欧战爆发后，亚洲战场与欧洲战场也是两个独立的战场，抗击的敌人是不一样的。尽管1940年9月，德意日结成三国军事同盟，但这只是名义上的，日本与德意仍然是各自为战，并无联合军事行动。中国还与德国保持着外交关系，直到1941年7月，德意为了换取日本承认欧洲“新秩序”，承认汪伪政权，中国才从德意召回大使，与之断交。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苏联成为反击德国法西斯的主力，但丝毫不影响中国仍是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主力，苏联因为要全力对付德国法西斯而断绝了对中国的援助，德国也没有进攻中国的计划。当时苏联与日本之间有1941年4月13日签订的《苏日中立条约》，规定苏日互相友好、互不侵犯和战时中立。也就是说，日本军国主义当时是中国的的主要敌人，而苏联与日本是友好国家，中国的抗日战线是独立对敌，并不从属于苏联抗击德国法西斯的战线，有一种观点，把中国说成是苏联的“第二战线”，并不符合事实。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美

国卷入战争。中国号召建立反法西斯军事同盟，要求英美重视中国战场，扩大对华援助，但美军主要是在太平洋和东南亚与日军作战。1942年美国向中国提供了5亿美元贷款和8457亿美元租借物资，美国援华空军第14航空队直接参加了中国的抗日战争，美国还帮助中国训练陆军和空军人员，中国为美国空军轰炸日本提供机场。如果亚洲战场和太平洋战场被看成是两个战线的話，那也是美国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线是中国抗日战争的第二战线。

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是四大国中力量最弱的国家，不仅抗击着日本法西斯的主力，阻止日军北进，拖延日军南进，并2次入缅作战直接帮助盟军。中国没有做过任何损害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其他国家利益之事，但是，英美苏却做了一些有损中国利益之事。如：1940年7月英国在日本的压力下关闭滇缅公路3个月，切断了中国与外界的联系；苏联与日本签订中立条约，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与不可侵犯，日本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与不可侵犯，有损中国主权；1945年2月在雅尔塔会议上，英美苏签署秘密协议，以出卖中国利益为代价换取苏联出兵中国东北。

习近平主席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在那场战争中，中国人民以巨大民族牺牲支撑起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中国人民将永远铭记各国人民为中国抗战胜利作出的贡献！”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中国始终是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主力，绝大部分日军被拖在中国战场。虽然日本人投降有美国和苏联参战的因素，但他们只是促进日本投降的因素。

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日本对华侵略是法西斯在世界侵略扩张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30年代中期，德意日3个法西斯国家结成同盟，对外侵略扩张，威胁着整个世界的和平与正义。日本法西斯既是中国人民的敌人，也是世界人民的敌人。中国人民肩负起挽救国家危亡、争取民族解放的历史使命，同时也是承担了保卫世界和平的责任。“在那场惨烈的战争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开始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中国人民经过14年的斗争才赢得了胜利。

在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建立前，中国的抗日战场就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抗日战争直接或间接支持了英国、美国和苏联抗击法西斯的战争。法西斯统治下的日本是一个野心大于能力的国家，企图与德意共同瓜分世界。日本长期存在北进战略，欲占领资源丰富的苏联西

伯利亚和远东地区，苏联也把日本作为重要威胁，在远东驻重兵防范。日本军国主义者曾狂妄地认为3个月就能灭亡中国，然后北进苏联，没想到中国军民在上海就坚持抗战3个月，粉碎了日本3个月灭亡中国的美梦。日本主力陷入中国战场的泥沼不能自拔，使日本无法实现北进计划。苏联卫国战争开始后，斯大林得到佐尔格关于日军无力北进的情报后，把数十万准备用来对付日本的军队从东线调往西线。这些军人在参加完11月7日红场阅兵后便直接开赴前线，取得了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中国的抗日战争在关键时刻对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发挥了巨大作用。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正式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交战国。1942年元旦，美、英、苏、中等26国共同签署了《联合国共同宣言》，中国成为世界“四强之一”，并与美国正式结为同盟。此时形成的局面是，中美英是反对德意日的同盟国，而苏联仍然遵守《苏日中立条约》，并未参与反日同盟。1月3日，反法西斯同盟国宣布，盟军建立中国战区，史迪威被美国总统罗斯福派到中国战区任总参谋长。中国战区不仅包括中国，还包括东南亚的北部地区。1942年3月8日，日军攻占缅甸仰光，切断滇缅路，印度的安全也受到威胁，英国同意中国军队入缅作战。1942年3月12日，中国组建远征军，由罗卓英、杜聿明指挥，在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史迪威的领导下，入缅作战。中国派出了3个军9个师近10万人的远征军，由于英军战斗力弱，配合不佳，作战失利，但中国军队救出了7000多名英军，阻挡了日军向印度的进攻，自己付出了巨大牺牲。1944年，中国军队再次入缅作战，修筑了“史迪威公路”，打通了盟军由印度向东进军的通道。中国2次入缅作战投入兵力30余万，歼灭日军6万余人，成功地粉碎了德意日法西斯将欧亚战场连成一片的企图。

在欧洲战事结束后，反法西斯同盟才转而全力对付日本法西斯。在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美国对日本本土扔下2颗原子弹后，日本法西斯不得不投降。至战争结束时，日本在中国战区投降的军队达128万，占投降日军总人数一半以上，中国战区一共俘、毙、伤日军150余万，中国军民总伤亡则高达3500余万。中国遭受的直接财产损失达1000亿美元，间接损失达5000亿美元。中国的伤亡和损失超过任何一个参战国家，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巨大牺牲。

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全国各

族人民经过极其艰苦的斗争，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取得的。在八年全国抗战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装对敌作战125万余次，钳制和歼灭日军大量兵力，歼灭大部分伪军，敌后战场逐渐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主战场。抗日战争的实践表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核心。正是在抗日战争中，越来越广泛的人民群众了解 and 认识了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的胜利确立了中国的大国地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改变了20世纪世界历史的进程，抗日战争的胜利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这一伟大胜利，彻底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殖民奴役中国的图谋，洗刷了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来侵略屡战屡败的民族耻辱。这一伟大胜利，重新确立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使中国人民赢得了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尊敬。这一伟大胜利，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开启了古老中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新征程。”

1943年11月签署的《开罗宣言》，宣布中美英三国进行战争之目的，在于制止日本之侵略；中美英三国的宗旨在于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归还中国；在相当时期内，使朝鲜自由独立。这一宣言的签署也表明，中国不仅在为自己而战，也在为其他被压迫国家与民族而战。

中国参加了1944年第二阶段的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与美、苏、英三国共同发起了1945年春的旧金山会议。6月25日会议通过《联合国宪章》，次日签字，中国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成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联合国的创建过程中，中国作出了独特的贡献。这主要表现在中国作为东方国家的代表，努力为弱小国家伸张正义，强调国家平等、种族平等，中国代表团在这一方面所提的许多重要建议被联合国组织所采纳。

中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成就与贡献，奠定了中国的大国地位。中国的大国地位不是哪个国家恩赐的，是中国人民用巨大的民族牺牲换来的，是国际社会对中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贡献的承认。

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

不久，就遇到了一件重大的自然灾害，十分考验他的能力。这年，大雨日夜不止，黄河从曹村决口，河水很快就暴涨到徐州城下，城中的富家大族扶老携幼争相外逃躲避灾祸，一时间民众恐慌情绪蔓延，城中人心惶惶。当此千钧一发之际，苏轼又正词严地向全体同僚命令道：“诸位大人，黄河缺口，水注徐州，我决定从东南戏马台起至城墙这一带筑一长堤防洪，由大家分段负责。此事不得有误！”他起而行之、身先士卒，下定决心与徐州城共存亡。他马不停蹄地来到城门口坐镇指挥，对打算出城避难的豪强权贵进行规劝，劝其参与筑堤、加厚城墙；后来干脆搬到城墙上居住，参加劳动，日夜关注洪水的最新形势。在十万火急的时刻，他还冒着风险前往武卫营，恳请出兵相助。武卫营也被他的诚意和担当所感动，全力效命。在苏轼的统筹协调之下，官兵和民众分工协作、令行禁止、有序有效，终于保全了徐州城，更保全了百姓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同样，公元1089年，苏轼主政杭州，在疏浚西湖的过程中，由于要挖掘慧因高丽

寺旁的赤山硬土来筑湖堤，遭到高丽寺僧们的强烈反对，理由是：破坏风水，天降灾祸谁担当？赤山硬土挖还是不挖，苏轼反复掂量着心中的天平。孰轻孰重？“天地之间，莫贵乎民；悠悠万事，唯民为大。”苏轼挺身而出，告诉人们：“天降灾祸，全冲我来。”工程这才得以顺利进行，留下了一段“垂老舍身依古寺，长留真相在西湖”的千古佳话。

为官任事、制定政策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势制宜，从实际情况出发，找到精准症结，准确把握政策的时与机、弊与利。苏轼在处理政务的时候经常打破固有思维，讲究方法。初任凤翔府，苏轼为改革“衙前役”，他经过慎重研究，仔细比较分析其中的利害关系，发现地方官员没有经过实地调查，不关心百姓疾苦，一味蛮干，任意执行上级命令。他们要求在洪水暴涨时运送物资，因此造成生命财产损失，民众苦不堪言。苏轼认为，如果在黄河和渭水未进入涨潮期时运送物资，就不会使民众生命财产受到威胁。于是，他把情况具实上报，得以修改衙规。在任密州时，

盗贼蜂起，安抚司派遣三班凶悍的兵勇前来围剿捕捉，然而士兵纪律涣散，不听规劝，恣意妄为，有的甚至诬陷平民藏有禁物，随意进入百姓家中争抢财物、危害性命，后又畏罪潜逃。民众结伴前去请苏轼做主，苏轼不动声色地放出话来：“必不至于此。”他镇定自若，以平静的心态给民众吃了一颗定心丸。四处逃窜的士兵听到后，逐渐放松了警惕，苏轼就趁机把他们引出来全部除掉，还社会以太平。此外，在变法上，苏轼虽然对王安石变法总体持反对态度，但他常常能够有针对性的“因法以便民”，让民众得以免受祸患，从而安居乐业。比如，他减价出售常平仓的米，做了很多粥和药剂，派人带着医生到各街巷治病，救活了一大片；又比如，他组织勇力之人，授以兵器，加以训练，进行自保，维护地方治安等。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苏轼是一个真性情的人，他可以和文人雅士、达官显贵把酒赏月、吟诗作画，也可以跑到田间、水畔、山野、集市，追着农民、渔父、樵夫、商贩谈天说



□ 吉炳伟

范滂别母

东汉到了桓帝、灵帝的时代，朝政十分混乱，宦官专权严重，朝中一批正直的官员对此极为不满，并进行了不懈的斗争，范滂（河南涿人）就是其中较为著名的一个。

范滂从小就以节操闻名，有澄清天下的大志向，为官时不畏权贵，敢于整顿吏治，抑制豪强，尤其对宦官专权深恶痛绝。这些都深深触动了宦官佞臣的利益，他们把范滂等朝中正直官员视为眼中钉、肉中刺，诬陷这些官员结党营私，载以“党人”罪名，逮捕下狱。汉灵帝建宁二年（169年），又大肆逮捕“党人”，这一次，范滂名列其中。

“党人”当中，首先是督邮吴导，他是送逮捕范滂诏书的官员。吴导很有良心，知道范滂是被陷害的，想到自己将不得不奉命去助纣为虐，内心十分痛苦。在旅馆中，他关上房门，手捧朝廷所下诏书，躺在床上痛哭失声。范滂听到这些，心里立刻就明白了，对旁人说道：这一定是为了我的事。范滂这时没有选择逃跑，反而马上到县衙中投案。

第二个人物是县令郭揖。郭揖也是个正直的官员，见到范滂自动来投案，大吃一惊。他不假思索，毫不犹豫地解下县官大印，准备和范滂一起出逃。他劝范滂说：天下大得很，随处都可以藏身，您是冤枉的，为什么要在这里等死呢？范滂对郭揖说：只有我死了，这件事才能够平息。我怎么敢既连累你，又让我白发苍苍的老母亲为此到处漂泊，不得安宁？所以，范滂终于没有出逃。

第三个人物是范滂的老母亲。范滂被捕下狱后，老母亲来探望，母子相见，分外悲痛。范滂安慰老母亲说：我的弟弟仲博十分孝顺，他会好好照顾您老人家的。儿子马上要跟从黄泉之下的父亲去了。这样，也可以说我们母子俩都各得其所。只是恳请母亲大人，不要再想我了，不要过分悲伤。范滂的老母亲深明大义，她清楚自己儿子的品性，理解自己儿子的做法。强忍住自己的悲痛，勉励儿子说：我完全了解你的所作所为，你能够与李膺、杜密这些以正直而著称的官员齐名，死又有什么值得遗憾的，既要美好的名声，又要追求

长寿，这种好事是很难兼得的。

在与亲生儿子诀别的生死关头，这位善良的母亲没有痛哭流涕，也没有埋怨牢骚，更没有劝儿子屈服退缩，而是激励儿子不惧强暴，不畏牺牲，为了自己的理想而追求高节。

后人这样评论范滂母子的义举：“子伏其死而母欢其义，壮矣哉。”宋代大文学家苏东坡，就很受范滂母子的影响。《宋史·苏轼列传》曾记载母子二人的对话，小苏轼对母亲程氏说：我想做范滂这样的人，母亲答应吗？程氏说：你能做范滂，我怎么就不能做严格教子的滂母呢！宋代诗人陈造为此赋诗一首：“五载诗鸣卧雪堂，暮年长啸走南荒。当时戏彩慈亲侧，岂复陈编美范滂。”

宋代大书法家黄庭坚也曾书写《后汉书·范滂传》留存于世，据传是黄庭坚在受蔡京等奸臣迫害，羁縻宜州之地，走投无路之时，大义凛然，把千余字的《范滂传》背诵下来，大书长卷80页，全文圆转流畅，沉静典雅，笔力道劲，充分显示其对范滂这位“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之人的敬佩之意。



把『失意』活成『诗意』

□ 叶新

在今天的湖北省黄冈市，有一座遗爱湖公园，园内建有苏轼纪念馆、苏轼雕像、遗爱亭等文化景观。公元1080年，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团练副使，苏轼曾在《遗爱亭记》中表达了自己为官任事的价值观，开篇第一句便是：“何武所至，无赫赫名，去而人思之，此之谓‘遗爱’。”他认为，为官一任就该造福一方，不求做轰轰烈烈的大事，只求在点滴小事上关心老百姓。因此，即使在自己处境不顺、内心彷徨、生活拮据之时，他依然笑对困难，出“功成”之力而不求“功成”之誉，为百姓做了不少实事。苏轼一生经历了很多政治风波，大半辈子都在贬谪中度过，然而无论走到哪里，他都不忘为官之本，把“失意”活成了“诗意”，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而今，我们谈论苏轼，总是津津乐道于他所创作的诗词，殊不知，这些诗词背后所蕴藏的独特人生经历和个人魅力更值得探究。

三国时，诸葛亮提出了“识人七法”，其中一个就是告知以祸难而观其勇。公元1077年，苏轼到任徐州

